

发表于“啊，清华” 清华出版社 2007年4月

母校清华大学与我的戏曲情结

胡芝风

想摘两颗星星

我从十来岁开始，由于对艺术的兴趣，在父母的支持下，在读书的同时学戏。我父母为我聘请了很多老师为我授教：京剧老师是魏莲芳、杨畹农、包幼蝶、吴继兰、薛兰芬、杨小佩等；昆剧老师是方传芸、朱传茗等；王福卿老师教我梆子戏的身段，还有练功的老师刘君麟等。1956年夏，我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高中毕业了。学校老师动员我报考“保密专业”，因为我的功课还算可以；而教我戏的老师们都鼓励我可以“下海”唱戏了，父母则说尊重我自己的选择。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呢？在我登攀知识巅峰时，感到其乐无穷，很向往做一个工程师；而当我在艺术海洋中遨游时，又感到无比的享受，很向往当一名京剧演员。所以，我想读书、学戏两样都不丢下。于是，我决定先考考看，如果考不上大学再“下海”唱戏。于是我带着“听天由命”的想法，在高考志愿表上，填了两所大学：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和复旦大学物理系，就这样犹犹豫豫地参加了高考。

当邮递员把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时，我正在向朱传茗老师学昆剧《断桥》。朱传茗老师显得有些惋惜，他对我说：“考取清华大学真是不容易。不过，你已经学会了三四十出戏了，如果你唱戏也是有前途的，不当演员有点可惜……”我看着录取单也不知是喜是愁。当我把朱老师送出弄堂时，望着他的背影，心中若有所失。

在赴北京上学离家前，我在家里练功房里整理要带走的练功刀枪把子和好几本学戏笔记，心中有些怅然。但是，好像听见他们在对我说“别难过，我们不是还在一起吗？”是啊，我去读大学，还是可以再继续学戏，读完了不是还是可以“下海”唱戏的吗？——想摘两颗星星是我心中潜在的蒙胧的幻想。

扛了刀枪把子报到

清华大学是我国第一流的理工科大学，是中国科学家的摇篮，它的巨大吸引力终于使我怀着矛盾而兴奋的心情，奔向她的怀抱。1956年夏天，正好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先生带团要经过北京，出国访问演出，我父亲当年是他的秘书，便顺便陪我一起上北京，去清华大学报到。走出北京火车站，就看到一排各大专院校的新生接待站，我父亲陪我走到清华大学的新生接待站前，接待的工作人员见我随身携带一捆刀枪把子，很奇怪地问我：“你是报到的吗？”我点了点头，他们指了指我的刀枪把子说：“那你这是……”我回答说：“这是练功用的。”他们

越发奇怪了：“怎么读理工科还要练功？”我一时说不清楚，只好笑了笑算是回答。

对我这个从密集人口的上海来到“清华园”的新生来说，这里的一切都很新鲜：第一个感觉就是“大”：校园很大，图书馆很大，“阶梯”教室很大，拱形礼堂也很大，最让我惊喜的是学校有两个很大的体育馆，我心里呼喊起来：“太好了！”只要占领它的一个角落，就够我尽情练功了！

大学生的生活开始了，我是工程物理系 116 班，全班共有六位女生，被分配同住在 14 号宿舍楼走廊的最后一间，这间屋子是这层楼道里最大的一间。里面有三张上下双人木床，中间有两张大书桌。说来很巧，我们六位女生的生肖都属虎。我们找了一张绘有虎头的大年画，把虎形沿轮廓剪下来，贴在门上，以壮“虎威”。女同学们都来自外地，我记得她们的名字是乐瑶、刘汉崙、郑丽娟、刘延莘和董楚琴。女同学们学习都很用功，每天读书读到深夜，连星期日也很少出去玩。她们的生活很简朴，一点不讲究穿着打扮，都是剪短发或是梳两根辫子。这种简朴的生活习惯，给了我深刻的影响，那时还没有尼龙袜，纱袜很容易破，我就买了个袜底板，学着补袜子。我们吃饭在大食堂，交一张餐票可以领一大盘菜，主食不限量，花色品种很多，有米饭、馒头、花卷、包子、粥、面条，有时还有面包等。食堂摆满了四方桌子，没有凳子，大家都站着用餐。我的胃口好极了，每顿要吃六、七两主食，有时菜不够吃了，就到领菜的地方去添上点。我有时还到清华园里我中学同学的哥哥田福庭家去吃饭（他夫妇都是清华大学的讲师），有时星期天去他家，田伯母就做了南方菜招待我“改善生活”。我在第一个学期寒假回家，已经变成了个小胖子，妈妈说是在北京吃面食“发”的。那时，在学校有 25 元左右生活费就很足够了。

体育课练功

我到学校报到后的第二天，就扛着刀枪把子走进了体育馆。体育馆经常有不少人在练体育项目。我就在一个角落，换上了球鞋，脱了外衣，拿起刀枪把子就练起功来。体育馆很讲究，还有洗澡间，地板是打了蜡的。我一活动，差点滑跤。后来我就特别注意脚步要防滑跌。由于体育馆很大，我在练跑园场、耍刀花、舞双枪、跑虎跳这些基本功时，都很撒得开，非常舒畅。体育馆里还有很厚的运动垫子，尽可以练毯子功，比我在家里练功要痛快得多。起初，我在练功时，体育馆里运动的人都会好奇地停下来，站在远处或走近来看我，围观的人很多，我就把他们当观众，练得格外起劲。后来大家看惯了就不那么好奇，见怪不怪了，也就没有太多人看了。由于读书时间紧张，我感到练功的时间不够。体育课老师经我的请求，允许我免上体育课，同意我把练功当作锻炼，不过要我照常参加体育考试和参加运动会的比赛。我小时候生性好动，父亲曾培养我学习游泳，溜旱冰等体育活动。大概有这些运动基础，所以，我在清华举办的运动会上，参加百米赛跑比赛时，得过第二名。

清华京剧社

进校不久，有一天，我在体育馆练功时，来了一位男同学，他自我介绍说：“我是清华京剧社的社长，叫徐路，我是电机系53年入学的。”。我才知道我们学校原来还有个京剧社！接着他又问我“你学过不少戏了吧？”我点点头说：“我小时候就开始学京剧和昆曲。”他问我：“你愿意参加我们京剧社吗？”我高兴得很，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愿意啊！”就这样，我成了清华京剧社的一名艺友。社里“演员”的行当还挺整齐，花旦、青衣、老生、小生、花脸、丑行等行当都有。拉京胡的琴师是动力系同学曾纪申，拉二胡的琴师是工程物理系的傅瑞峰，他们都比我高一年级，他们的操琴水平都很不错。我每星期吊嗓约三次，吊嗓子的地点是学校的“音乐室”，那是一排平房，几乎每个房间里都有一架钢琴。因为我小时候学过三年钢琴，后来由于学戏，时间不够，弹琴就停学了。我有时吊嗓去早了，我就一边等着琴师一边弹琴，过把瘾。

京剧社要演出了！机械系55年入学的孙汝洁主演《拾玉镯》，我的剧目是《穆柯寨》，我主演穆桂英，54年前入学的机械系余振祥同学主演杨宗保。排戏时，无论是主演还是龙套，还是乐队伴奏，都相当认真，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调度，每一个表情，每一个锣鼓和音符……都像做科学实验一样的认真，一丝不苟。演出那天，大礼堂里挤得满满的，学校很多老师和同学来看戏，我班上的同学们几乎全都来“捧场”。在热烈的观众掌声的鼓励中，演出很是顺利。第二年我们京剧社又在大礼堂演出，我的剧目是《霸王别姬》，我主演虞姬，同学54年入校的建筑系同学姚福兴主演项羽。说到母校的大礼堂，我对它十分有感情，在那个舞台上向老师同学们展现我们京剧社的表演，还有观摩歌舞队的表演，礼堂平时还常常放映优秀的国内外电影。

1981年初，我所在的苏州市京剧团结束了一个多月的晋京演出后，我作为主演和团长，带了剧团回母校，回母校的大礼堂演出了京剧《李慧娘》。1994年，我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又回母校参加纪念活动，还是在这熟悉的拱形的大礼堂里，又和当年京剧社的老社友和新社友们合作演出了一次《霸王别姬》，事隔近40年，主演项羽的还是当年的老搭档姚福兴。最近，我回母校观摩了“纪念清华京剧队复建十周年”的演出活动，只见舞台上一批京剧爱好者人才，母校重视传统文化的弘扬，令我十分兴奋和激动！直到现在，只要一想起这座拱形大礼堂，我的心里总是暖烘烘的。

优良的校风

清华园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理想、有抱负，这种理想和抱负净化着人们的心灵，促使人们不断求知，奋发向上。当年印象最深的有两组“占座位”的镜头：一组镜头是教室占座位，同学们为了更清楚地听老师讲课，大家都想占领一个靠前的座位。由于我们每节课都要更换教室楼，教室楼之间相距都不近，前一堂课后，大家就像百米冲刺般地向下一堂课的教室楼奔去，尤其几个班一起上“大

课”时，就更紧张了，我也加入了占座位的行列，下了课就使劲跑。后来，我发现有的同学骑自行车就很沾光，可以轻松早早到达教室，于是我也从上海家里运来了自行车，半机械化保证了我每堂课都能坐到比较前面的座位；另一组令我难忘的镜头是图书馆占位。清华图书馆的每个阅览室的两壁都摆满了书，可以自由取阅，看完把书放回原处，十分方便。可是阅览室的座位，从早到晚几乎都是坐满的，难得有空位子。逢到考试，图书馆的座位更成了“必争之地”。放寒假前考试期间，正是寒冬腊月，地面积起了厚厚的冰雪，我和同宿舍的女同学们天蒙蒙亮就起身，还没等跑到图书馆，远远望去已经看到有不少人密集在图书馆门前了。大家冒着风雪，两手呵着气，一面跺着脚，等图书馆一开门，大家蜂拥而进，赶紧占领一席之地，成为第一批阅读者。我的脑子里，只有两件事——努力读书和努力学戏。

只能摘一颗星

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我父亲为我聘请北京京剧前辈表演艺术家芙蓉草老师为我教戏，每逢星期日我到他家中去学戏。可是路途要2个来小时，很费时间。因此，我只能利用寒、暑假回上海的这段时间，如饥似渴地继续学戏、练功、吊嗓。由于在北京读书进城学戏不方便，为了想继续圆一边读书、一边学戏的梦，我希望能转学到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就读。清华大学教务处领导为了帮助我解决读书和学艺“两不误”，与上海复旦大学联系转学。可是由于复旦大学物理系没有名额，只得作罢。此后，我渐渐意识到，无论科学或艺术，都需要一个人化毕生的精力，才能有所成绩。可我只有一个生命，看来，我在进大学前，想把科学和艺术两个星星都摘下是天真的不现实的奢望。这时，我冷静下来，当我掂量科学和艺术这两颗星星在我心头天平上的份量时，我发现它是悄悄地偏向艺术这一边。京剧艺术已经和我的生命联贯在一起了——我选择了艺术。我把自己的想法向母校班主任和教务处领导作了汇报后，领导经过郑重研究，作了对我一生有影响的考虑：“你的学习成绩还可以，京戏也演得不错。学校认为应该人尽其才，可是我们都是京剧外行。不可能做出最正确的估价。学校现在决定特准你休学一年，你可以到专业的京剧团体去实践，如果他们认为你合格当一名京剧演员，学校可以放心让你退学；如果他们认为你没有前途，学校欢迎你返校继续上学。”一席话说得我热泪盈眶，没有想到母校领导为我考虑得这么周到。

回上海后，1958年底，经我父亲朋友杜宣先生介绍，我到广州市京剧团作实践演出。我主演文武花衫戏。团长傅祥麟是麒派表演艺术家，他除了分配我演戏，还让我创作编排新戏的身段，我得到充分的艺术实践。广州市京剧团常常到部队演出，文化界喜欢京剧的人也很多，傅团长还专门带我们几位主演到陈寅恪教授家里去拜访求教。陈老很懂戏，为我们讲不少掌故。我们为他清唱，他高兴地用手为我们打板。1959年秋，我休学快满一年时，广州市京剧团为我出具了艺术鉴定，认为我在京剧事业上有前途，希望清华大学同意我转入艺术道路。不久，我便收到母校教务处同意我辍学演戏的回文。那时我的心情是既充满对清华母校的留恋，又为可以演戏而激动。1959年12月，经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先生向梅兰芳

先生推荐，梅先生同意收我这个“大学生小徒弟”，我父亲专程陪我到北京拜梅兰芳先生为师，由此得到梅先生的教诲，艺术境界的提高。那天，出席拜师会的有欧阳予倩、俞振飞、言慧珠、徐兰沅等二十几位前辈戏剧家和京剧表演艺术家。

作为一名即将投入艺术战线的新兵，我暗下决心，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要咬牙坚持下去，牢记清华母校培养我的人生观，不为名利，勤奋工作，以毕生精力从奉献京剧事业。一定要对得起母校领导和师生们对我的期望，争取向母校交出满意的答卷。

惜别清华园

1960年8月，我到苏州市京剧团担任主演，后兼任团长。在我这段从事舞台艺术时期，转辗工农兵中，我每年主演近300场。有时在露天舞台演出，夏天吃蚊子，冬天喝西北风，尽管很辛苦，但是在艺术海洋中遨游，感到很幸福。在十年浩劫期间，由于江苏省的市级剧团的体制都是“大集体”，剧团不演出，工资就没有来源。由于观众喜欢看我的表演，所以造反派不得不让我担任“样板戏”的主演。于是，我白天挨斗，晚上主演“样板戏”，白天是“狗熊”，晚上是“英雄”。那时尽管体力上和精神上都很疲惫，但是，我没有脱离舞台，主演了李铁梅、阿庆嫂、方海珍、江水英、柯湘等……延续着我的舞台生命。直到1985年转入理论研究，粗略估计，我总共演出过约6000余场。

母校给予我的一种探索求知的精神，所以，在苏州市京剧团演出时，我常常主持把老戏推陈出新，在继承基础上创新的探索。1980年底，我主演的《李慧娘》晋京演出，得到中国文化部的嘉奖，并派我们到香港演出。香港观众认同我和我们团的创新探索。同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此剧拍摄成同名电影，由刘琼担任导演。我很幸运，他对戏曲与电影两门艺术的美学思想“契合点”找得很好，他既保留戏曲表演程式，又运用电影手法极大地提升了原先舞台表演的魅力。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1981年获得国文化部“最佳戏曲电影片奖”。我荣幸地在1982年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

为了能不断超越自己，在我心目中，潜在着理论“充电”的向往。正好1985年初，我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寄给我的“戏曲理论研究生招生简章”。在江苏省文化厅领导和苏州市文化局领导的支持下，我于1985年9月踏进中国艺术研究院，开始我的崭新的理论学习生活。“研究生班”共有40多位同学，包括搞编剧、导演、舞美、音乐、评论和表演等专业。两年里，研究生班教务处聘请了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高等院校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教授和戏曲界的学者为我们讲课。学习的课程有《中国文学史》、《中国戏曲史》、《戏曲艺术概论》、《中国古典美学》、《外国戏剧》、《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英语》等课程。我们都很努力，课余都把自己关在宿舍看书和写文章，很少出去闲逛，有的同学课余还攻读外文夜校，我带着录音机听课，便于课后复习，并且也找了一个夜校报名补习英语。

1987年7月，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理论研究班结业。研究院的领导和张庚、郭汉城、阿甲、马少波等前辈戏曲理论家们认为需要有舞台经验的人来搞表演、导演理论研究，希望我留下来搞研究工作。我是既高兴又矛盾：如果进入“研究院”的大门，对我来说，是攀登一个新的艺术座标。在两年的学习过程中，我撰写了一些论文和评论文章，并应邀对一些剧团作导演实践，我认识到理论研究对于戏曲艺术发展的重要性。但我又留恋舞台，熟悉和关心我的人包括江苏省的有些文化领导，认为我正是在舞台发挥表演的最好的时光。这时，我想起高尔基的一句话：“一个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经过艰难的思想斗争，我决定留下，坐理论研究的“冷板凳”。在文化部领导和前辈宋任穷的关心支持下，得到江苏省省委、省政府、文化厅领导的批准，1989年，我正式调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从事戏曲表演、导演理论研究和导演工作。

艺术，只有开始……

这次，我从舞台实践走向理论研究，又是我人生的一个大转折，但是，对我来说，艺术只有开始，没有终止。在以往的认识中，“艺术”属于形象思维；而“科学”则是与机械、数字、理念等相关联的逻辑思维，与“艺术”似乎格格不入。由于清华园的科学思维的影响，我始终认为艺术与科学是互相渗透的，艺术的生存和发展，都有其科学原理可寻。法国作家福楼拜更明确地指出艺术的科学发展观：“越往前进，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者从山麓分手，回头又在山顶汇合。”用科学思维来研究和指导戏曲创作实践和教学实践，是减少继承和创新过程的盲目性和提高表演质量的根本，这是21世纪赋予戏曲理论界、教育界、舞台创作者们的历史使命。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不断地进行“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我完成并出版了著作有《艺海风帆》、《胡芝风谈艺》、《戏曲演员创造角色论》、《戏曲艺术二度创作论》、《戏曲舞台艺术创作规律》等；发表的改编剧本有《李慧娘》、《百花公主》、《灰阑记》、《双玉蝉》、《杜十娘》等。我探索运用物理原理，研究表演技能和形态戏规律，应用在提高演员表演的实践中，在我为10多个剧种导演的戏中，有10多位主演获得“梅花奖”等国家级奖项。还应邀到母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等院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以及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奥尔胡斯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演艺学院等高等院校讲学。

回忆近40多年来的艺术生涯，我感谢清华大学的领导，当年在我选择艺术事业时，为我的前途所作的周到考虑。我在艺术事业上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与清华园母校的教育和优良校风是分不开的。我将继续努力学习和不断求索，以不辜负清华园母校对我的培养和教育。